

本期导读
B2 夜光杯
六十年后的二十五分钟
B7 译文
时光的痕迹

星期天夜光杯

本报副刊部主编 | 第 482 期 | 2013 年 9 月 29 日 星期日 责编:赵 美 视觉:叶 聆

B10 谈话

阅读不仅仅是私人的事情

B12 百姓纪事

驰车跃马 棋枰人生

赵冬苓:写作让我很愉快

◆ 陶禹舟

从 1992 年推出电视剧《大地缘》开始,赵冬苓已经写了二十多年剧本。不同于一般女编剧的感性、细腻,她的作品有很强的辨识度——厚重、大气,紧扣时代脉搏,追求个体、家国与历史的融合。从早些时候的《孔繁

森》、《任长霞》、《上学路上》,到近年来的《沂蒙》、《中国地》、《我的父亲母亲》,这种思考与坚守一以贯之,并总能“叫好又叫座”。和赵冬苓的采访,约在北京她儿子的家中。正值北方初秋,一袭简单灰衣的赵冬苓

坐在客厅里,向记者娓娓道来几十年的编剧生涯路。谈及做这一行最大的感触,她用“很愉快”三个字来形容,“创作给我带来一种特别愉快的感觉,没法想象如果有一天不写剧本了会怎样。”



1 改编《红高粱》“没束缚”

把莫言小说《红高粱家族》搬上荧屏,是今年电视圈的一件大事,同为山东人的赵冬苓正是这部戏的编剧。

说到挑起这个重担,她直言是“被裹挟”。“一开始山东卫视找到我的时候,我非常不愿意。毕竟珠玉在前,无论小说还是电影,影响力都太大了。”但制作方数次登门的诚意打动了赵冬苓,最终她“押上半生功名”,忐忑接手改编。

为了剧本创作,赵冬苓去了一趟莫言的家乡高密。“并非想发现什么故事,然后直接拿到剧本里来用。因为经历过书中那个时代的人都不在了,今天的高密也和过去完全不一样。”但她认为,身临其境与闭门造文就是不一样,“我会觉得很有底气。所以不管写什么,都坚持去当地看一看,感受一下。”这一次高密之旅,也让她抛开忐忑,建立信心:“特别是莫言的大哥,他一直跟我说要放松心态,给了我很大鼓励。”

写完大纲后,她和莫言见了一

面,聊了聊改编的想法。“《红高粱家族》之所以那么火,就是因为张扬人物个性,追求精神解放。莫言希望改编上能秉持这一点。”土匪文化也是莫言期待剧版《红高粱》能保留的。“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土匪,但很少有文学、影视作品从文化层面上来探讨这一现象。所以电视剧对这一块将会予以浓墨重彩。”赵冬苓说。

除此之外,莫言和赵冬苓一致认为“不要受原著任何束缚”。在赵冬苓看来,小说与剧本是两种艺术:“小说可以主要抒发感情、表达意象,但电视剧必须得有庞大、扎实的故事情节支撑。”为此,她在原有的故事基础上进行了调整、扩充,并重新塑造和编织了人物性格、关系:“比如原著中一笔带过的县长曹梦九,我以他为原型人物之一,塑造了一个非常有理想的民国基层官员朱豪三。”



▲ 电影《任长霞》剧照

▼ 电影《郑培民》剧照



3 实地走出来“主旋律”

“主旋律”是赵冬苓早期创作生涯的一个关键词,她写过很多《新闻联播》里的时代先锋,电视剧《孔繁森》和电影《郑培民》、《任长霞》更构成她创作年表中的“当代英模三部曲”。

许多人评价,赵冬苓是极少数能将“主旋律”写得好看的编剧之一,她笔下的英模人物,血肉丰满、个性突出,不仅有高尚的信念和追求,也有遇到困难时的矛盾和痛苦。“他们也是普通人,也会有七情六欲,只‘提纯’英雄事迹反倒显得不真实。”赵冬苓倾向于展现英雄的凡人情缘。所以,《孔繁森》中,援藏楷模孔繁森会因为电话里母亲一声“三儿”,跪倒在地,颤抖着叫了一声“妈”;《郑培民》里,省委书记郑培民会掏出五块钱给老伴买双三块钱的鞋,然后等着人家找两块;《任长霞》中,执法如山的任长霞会在深夜探案发现场时,因为夜猫子的叫声,吓得躲在战友身后……

为了挖掘这些鲜活生动的细节,赵冬苓下了苦功夫。每次创作开始前,她都要去当地采访:“去了解这个人,了解他(她)的事情。我写这个人的前提是,我被他(她)感动了,我认可他(她)。”

孔繁森去世后,赵冬苓曾两度进藏,克服严寒气候与高原反应的困扰,辗转拉萨、日喀则等多地,走访他的亲友和同事。“第一次去正赶上孔繁森的追悼会,两个藏族青年哭倒在地,身上全是土和泪,拖都拖不起来。”这让她深受触动,“当时我就想,非亲非故的人能伤心成这样,这个人身上肯定有些不寻常的东西。”走访孔繁森简陋的家时,也发生了一个“小插曲”,“有人无意中拉了一下衣柜的门,里面的衣服‘哗’地倒了出来,全是孔繁森收养的小孩子的衣服,没有一件是他自己的。”这个细节也让她体会到了孔繁森对藏族孤儿深深的爱。

4 生活中发现“好故事”

赵冬苓的很多作品,都缘于生活中独特的发现。2003 年,她受邀去宁夏西海固采访。一行五人,白天在黄土中颠簸,晚上睡在农家炕头上。“一次偶然的谈话中,我听说同心县有人特别会做生意,‘早上出门拿一个鸡蛋,走出五里路,这个鸡蛋就能变成五块钱’。这句话当时在我脑子里一闪,创作思路一下子打开了。”于是就有了后来斩获国内外多项大奖的《上学路上》。这部电影里,小姑娘王燕为了不辍学,从家里偷了十个鸡蛋作本钱,最终为自己挣够 24.8 元学杂费的故事感动了无数人。

也因为慧眼独具的观察力,赵冬苓写出了 2011 年的热播抗日大剧《中国地》。此剧缘自网上一篇不到 2000 字的文章,介绍东北沦陷期间,辽宁朝阳清风岭 14 年对抗伪满洲国统治,不被日军占领的历史。这篇小文章引发了赵冬苓的强烈兴趣,并促使她前往当地考察。“到那后还发现有‘九反朝阳’之说,也就是历朝历代都没能把这儿的人治服帖。”这让赵冬苓如获至宝,创作电视剧《中国地》的想法由此产生。她将原本一千多字的短文扩充为一部长达三十八集、剧情跌宕起伏的电视剧,并塑造出赵老噶、王思恺、杜二脑袋等一批极具个性的“平民英雄”形象。该剧的热播也让这段鲜有人知的抗战传奇一朝传遍天下。

生活中的赵冬苓相当朴素,“我不化妆、不美容,也没有任何首饰。钻石对我来说就是石头,实在看不出还有其他什么价值。”除了写作,她基本上没有其他爱好:“几乎不出门,每天就是写作、查资料、看书,只有傍晚会和先生一起出去散会几步。”赵冬苓认为介入生活的姿态很重要:“作家在生活中是观众而非演员。各种聚会参加多了,就变成了演员,一直被人关注,很难再观察生活。”



▲ 新获国内外多项大奖的《上学路上》

▼ 2011 年的热播抗日大剧《中国地》



2 “四分钱”踏上影视路

1953 年出生的赵冬苓从小就喜欢写作,但时代的无奈阻断了她的求学路。1966 年,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,正读初一的赵冬苓被迫辍学,加入了“上山下乡”的“大军”。幸运的是,这段“插队落户”的经历并不长,三年后的春天,她成为了率先“回城”的一员,进入济南一家经济单位做行政工作。

在当时人的眼里,这份工作体面又安逸,但对赵冬苓来说,那段记忆里满是灰色的阴霾:“每天都做重复的事情。在机关呆了 18 年,感觉和 18 天没什么区别。”工作之余,她也写小说,但苦闷于找不到创作方向,“那是一段特别孤独的个人奋斗过程,充满了自我怀疑,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这块材料,也不知道将来是否会有成就。”

1987 年对赵冬苓来说是个转折点,那一年她调入刚成立不久的山东影视制作中心,从此打开影视

剧创作的大门,开始在这条路上“狂奔”。很多人都知这纸“调令”改变了赵冬苓的人生,却不知它背后有一个传奇的“四分钱”故事。“当时听到中心成立,我特别想去,就给广播电视厅的领导写了封信,那时候本市平信邮寄费才四分钱。”赵冬苓本不抱太大希望,没想到不到半个月,厅里就派人告诉她,可以借调过去了。“今天想起来都觉得像‘天方夜谭’。我当时一没名气,二不认识领导,仅凭一封自荐信就调进来,实在是太幸运了。”

1992 年,赵冬苓写出了第一部电视剧《大地缘》,并因此荣获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奖”。她透露,这部电视剧的“出笼”颇为坎坷:“当时电视剧基本没市场,剧本写出来也不知道找谁投资,为了资金我们费了很大力,中间一度都绝望了。”赵冬苓直言这部戏对自己来说特别关键,“假如当时放弃,可能编剧梦也就破碎了。”

电视剧《我的父亲母亲》剧照

